

# 人 向 自 我 的 递 归

## ——试析 20 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人本意识

王 轶 梅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20 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人类相应的异化,但人类在每一次相应的异化中都极力地寻找着自我。从《老人与海》的追求意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性意识,《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战争意识,到《变形记》和《局外人》中的孤独意识,无不体现了人类在文明进程中一次次面对自我的回归意向。这种回归以其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挣脱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套在自己身上的种种非人化枷锁。

**关键词:**现代派文学;文明;异化;自我;抗争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420(2006)02-0056-06

20 世纪显然是个激动人心的世纪。文明的飞跃使异化走向了一个历史的转折,人类站在这个转折点上发现了异化,从而真正发现了自己。由于异化本身的文明性质使异化成为一种与文明发展相应的共存物,只要人类文明不停止发展,异化现象就不会从人类的历史上消失。既然异化是人类历史进步必然带来的退步,那么作为一种人类审美活动的文学就必然在这种退步面前显示自己的抗争。文学在这样的抗争中自我生长着,生长为具有人本意识的人类审美客体。相对于 19 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在 20 世纪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人性内容。它不再是对人的一味赞美而是对人所陷入的非人化处境的揭示和抗争,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人的形象性描绘上而趋向了对人的意象性呈现,也不再仅仅把人当作一幅社会历史图景而深入到了人的潜意识心理以及与之相应的集体无意识世界。比如说荒诞派文学,荒诞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在一个不能自主的世界里体现自己的自主性,在一个没有个性的社会里体现自己的个性,文学在 20 世纪文明进步面前表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现代文化意识。诸如《老人与海》中的追求意识,《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战争意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意识,《变形记》和《局外人》中的孤独意识等等。文学的各种现代意识表明,人

在文学中不是一个抽象而美好的形象,而是一个个具体而痛苦自我。这种人的自我意识标志出了人道主义从 19 世纪向 20 世纪的深化过程——人向自我的递归。

### 《老人与海》中的追求意识

作为一个故事,《老人与海》同它的画面一样简单:一个老人,出海打鱼;打鱼归来,两手空空。整个小说仿佛讲了一个毫无结果的故事,讲了一个古里古怪的渔夫,讲了一个变幻莫测的大海。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对这个故事,这个渔夫和这个大海激动不已呢?人们在二战后对世界的看法和对自己的认识也许是理解这篇小说的重要线索。

规模空前的战争结束后,从大轰炸、大屠杀、集中营、原子弹等等阴影下走出来的人们,望着一块块焦土和一片片废墟,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迷惘和空虚。胜利的欢欣,失败的沮丧,仿佛一片过眼云烟,稍纵即逝。人们普遍陷于一种痛苦而冷静的反思之中。科学的进步,技术的发达,一方面带来文明社会的突飞猛进,一方面造成前所未有的惨绝人寰。高度发达的智慧将人类面对自然和社会的追求又进一步转向了面对自身的探索。每一个人似乎都在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寻找自己失落了的目标。人人都皱着眉头苦着脸,偶而吹上几声玩世不

恭的口哨。从战争中过来的人们一个比一个成熟,一个比一个不耐烦。就在这样的情绪氛围下,《老人与海》及时地问世了。它使人们惊喜若狂,因为他们在那个老人与那片大海中一下子发现了自己和自己所身处的世界。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从那凶险的大海和残忍的鲨鱼联想到自己经历过的种种现实,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在老渔夫桑蒂亚哥刚毅顽强的脸上对照出自己的面容。一场人与自然的搏斗仿佛一场人生演习一样,把人们心中最为隐秘的时常感觉到又往往说不清的东西一下子生动鲜明地表现了出来。更为人神往的是,《老人与海》不仅展示了人人都感受过并且还在感受的现实世界,而且为人们在这样的世界中如何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个英雄主义的强者榜样。“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sup>[1]288</sup>这种英雄主义是现实严酷逼迫之下的顽强搏战。它没有天真的热情,也没有现世的欢乐,有的只是峻冷的孤独和悲怆的胜利。这种孤独和这种悲怆构成了桑蒂亚哥不同以往的追求特色。

在以往的追求者那里,不是跟随着纯朴忠实的农民,就是陪伴着法力无穷的魔鬼。然而这一切在桑蒂亚哥那里是完全不同了。在茫茫大海上,他所面对的除了鲨鱼就是他自己。人们在堂·吉珂德那里可以找到一个骑士阶层,在浮士德那里可以发现一个新兴阶级,但在桑蒂亚哥那里看到的惟有桑蒂亚哥而已。因为这时的文学已经从对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的关注上转到了对人本身的关注,而追求者形象也相应地只具有人或人类的象征意义而不带有集团力量的政治色彩。人类的追求意识从一种人物形象所具有的历史指向转化成对人和人类存在本身的观照。因为随着历史的进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尽管“我”常常和这个或那个“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一起,但最为根本的仍然是“我”和自然、“我”和社会、“我”和他人、“我”和“我”自己的关系。桑蒂亚哥的孤独给了人们一种“我”和当“我”面对搏战时的展示,虽然这样的境遇不免有些悲凉,但他比堂·吉珂德和浮士德形象更为亲切更为深入地唤起了沉睡在战后的人们内心深处的种种意识和情愫。小说借此以作者那双粗糙的大手抚慰到了人们心灵世界中最为隐秘的角落。

##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的性意识

当文学的笔锋透过婚姻家庭等等社会关系的表

层而深入到性心理的深层结构时,人们发现构成人类自身再生产的性冲动和性交合,作为一种人的自然本性,悄无声息地渗透在人类整个的心理结构之中,渗透在各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之中。如果说,现代心理学的创立使人类对自身性本能的认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那么,以两性关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性文学则充当了将人类从蒙昧无知的黑暗引向观照自身的光明世界的自由女神。相形之下,性文学要比现代心理学更早地意识到,被传统道德视为污秽下流的性欲本能对于唤起人类的身心解放具有重大的意义。性文学以其独具的审美力量,呈现出人类特有的自由境界。

相对于《十日谈》和《忏悔录》,D·H·劳伦斯的小说在深化爱情的同时突出了性的力量。在他眼里,性行为“既不是为了繁衍后代,也不是为了生理上健康的需要,也不是为了寻欢……而是把你自己奉献给最伟大的、神秘的神明”<sup>[2]249</sup>。很难揣度劳伦斯所说的神明是什么,但他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却向文明社会显示了性的辉煌胜利。

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说的是本能的性欲战胜社会异化的故事。煤矿主查特莱男爵的夫人,由于下肢瘫痪的丈夫丧失了性功能,在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中被文明社会禁锢得奄奄一息。结果她爱上了看林人梅勒斯,而梅勒斯通过性的交合救活了查特莱夫人,使她获得新生,开始了幸福和谐的生活。如果人们了解了这部小说的梗概,再读一段劳伦斯的有关论述,就可以发现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寓言,或者说是一种象征。“只要我们的文明能教会我们如何让性爱的要求正确地、有力地流动,只要我们的文明能教会我们如何使性爱之火清晰可见、富有活力并让它以不同的力度与相互感染力来燃烧,来放出光芒,来燃起烈焰,那么,我们,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就会生活在爱里……”<sup>[3]2</sup>

从劳伦斯的这种理想出发,人们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所能看到的,一方面是失去生命力的查特莱男爵,一方面是充满生命力的梅勒斯,他们在查特莱夫人身上展开了理智和血性、机械的工业文明和人类的自然本性的激烈拼搏。这里展示的不是《十日谈》中的私下偷情,也不是《忏悔录》中的浪漫相爱,而是关系到人自身的生存问题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文明的进步一方面给人类带来越来越多的财富,一方面又使人类越来越丧失人的自然本性。文艺复兴所唤醒的性爱热情,在财富的堆积和权力的集中以及因财富与权力而来的残酷竞争角

逐之下,失去了青春的朝气和生命的活力。人在变成没有血性的机械,机械又回头吞噬着人的自然本性。劳伦斯面对如此冷酷荒唐的恶性循环,发现了摆脱这种循环的有力动因——性欲和性的交合。“回到自己就是回到身体。”<sup>[4]364</sup>这是人性中最为坚固的自然阵地。机械文明和异化社会可以吞噬人的一切情感,但惟独在性欲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因为这是人的本能,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要素,或者说是人的最为自然的自然本性。劳伦斯一方面从爱情中发掘起性欲本能,一方面又将性欲本能付诸对异化的有力抗争,使性欲不仅显得与爱情同样美好,而且显得比爱情更有价值。恩格斯说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都以另一种退步作为代价,而在此似乎还可以再续补上一句,每一次退步同时又造成了人类对自我本性的开掘和深化。劳伦斯以一个文学天才特有的敏锐感受意识到了这一点,从而以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常有的执拗将性欲提升到极为崇高的审美境界,作出了生命意志之于机械文明的那种强硬而猛烈的反抗。《十日谈》的天真欢快,《忏悔录》的青春浪漫,在劳伦斯那里通通被诉诸十分清醒的理性思考,而从这种思考中得出的结论又恰恰是对理性的摒弃和对血肉的崇拜。轻纱薄雾般的理想爱情变成了坚如磐石的性的审美观照,下流猥亵的欲念升华为光辉灿烂的生命火焰,“性会发出一种光辉,令世界看起来柔和些,而生命也美好些”<sup>[5]353</sup>。劳伦斯藉此揭开了性文学崭新的一页。

##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战争意识

20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战争文学所承继的既不是激昂忠诚的爱国主义,也不是《战争与和平》那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而是混合在《伊里亚特》中的带有人情意味的英雄主义。这样的文学传统决定了其英雄主义不具有报效或济世的性质,而是对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最为古老的展示。正是这种重视人的尊严的文学历史传统,才使西方的战争文学在二次大战后急遽地走向了对战争英雄的怀疑和否定。这种厌战情绪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现代派的战争小说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叫做《永别了,武器》。

作为一部反战小说,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探讨的不是战争的意义,而是和武器的告别。小说通过亨利上尉与武器的道别告诉人们,解决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大家一齐扔掉武器。也许这样的和平

主义思想是空幻的,是缺乏现实性的,但它一点也不天真,它是人们站在二次大战的废墟上深思熟虑的反思结果。战争教训了人们,人们鄙弃了战争。从这种思考出发,亨利上尉走向了与武器的永久告别,就像当初勇敢地投入战场一样勇敢地脱离战场。这种反战的正义性使亨利上尉的厌战具有了光彩照人的意味。小说尽管以其女友凯瑟琳的猝死作结,但整个的爱情过程却写得阳光明媚,楚楚动人。对和平的渴望在此抹上一重不无诗意的理想光彩,作为一种令人欣慰的明亮色调与黑暗战争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给因战争而绝望的人们带来一丝由衷的微笑。微笑是长久的,几乎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从一片反战声浪中推出的《第五号屠场》和《第二十二条军规》。

相比于《永别了,武器》,冯尼格的《第五号屠场》没有一丝明亮的笑意,全然是一片阴森可怖的闷暗色调。这里看不到丝毫爱情的阳光,有的只是一个接一个的残酷玩笑。人们称之为“黑色幽默”。正如海明威恨恨地提出要与武器永别一样,冯尼格冷冷地补充道,战争是个屠宰场。差不多与此同时,约瑟夫·海勒醉醺醺地在一旁写着《第二十二条军规》。

如果在《第五号屠场》中还会看到愤愤不平的话,那么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则全然是不动声色的嘲笑讽刺,就好比中国武术中那种摇摇晃晃的“醉八仙”,这里一拳,那里一脚,一下下抨击的都是战争的罪恶,战争机器的冷酷无情、各级军官的利欲熏心。卡思特上校不停地提高飞行作战指标赶着飞行员上天卖命,谢司考普夫中尉为了操练不摆动双臂的步伐竟想用铜丝把飞行员的手腕固定在胯骨上,而伙食管理员迈洛则乘着战争机会飞来飞去地大做投机生意……在这架无形的战争绞肉机中被转来转去的士兵们像被判了缓期死刑的囚犯一样,一面及时行乐,一面提心吊胆地准备随时送命。第二十二条军规规定他们如果神经失常可以申请回国,然而第二十二条军规同时又规定,如果有人申请回国那就意味着他有保全自己性命的企图,而这种企图又正好证明是一种神志正常的表现。当主人公尤索林听到这样一条天衣无缝的军规时,忍不住“嘘——”地吹了声口哨,打心底里佩服它的美妙高超。这条军规几乎概括了战争的全部秘密。不知内情的人们一本正经地只知道使劲作战,洞悉个中隐秘的则可以在战争中巧妙地周旋着谋取尽可能多的自身利益。在这样一种五花八门的战争世界中,要

想保全自己又不危急别人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逃跑。在整个小说所展示的这幅荒诞不经的具有形而上意味的战争图景里,过去的战争英雄成了乐于送死的傻瓜,过去的可耻逃兵成了反抗的英雄。正如战争从《第五号屠场》中的残酷游戏变成了一场交易所里常见的生意经一样,英雄变成了非英雄,非英雄变成了英雄。在这之中,谁也弄不清楚是英雄把战争变成了生意,还是生意把英雄变成了非英雄。也许只有第二十二条军规才能对此作出圆满的解答。面对如此入木三分的讥嘲,且不说英雄主义的种种激情,即便是过去那种人道主义的种种哀怨,也显得苍白无力。剩下的只有幽默,黑色幽默,“sick humor”。正如冯尼格自己所说,“最大的笑声是建筑在最大的失望与最大的恐惧之上的”<sup>[5]202</sup>。

战争文学写到《第二十二条军规》可算是一种登峰造极。愈益残酷的战争事实和愈益可怕的战争威胁所激发出的,是更为深沉的人道主义情感。这种人道主义注重于清醒的洞察和讲求实际效果的行动。与19世纪的那种人道主义不同的是,它既不是雨果那样气势磅礴的呼号,也不是托尔斯泰那样热泪纵横的宣教,而是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它主张人们自己在战争面前作出选择,自己为生存进行斗争。过去的集体行动和阶级斗争意识,在此变成了更深一层的个人反抗,过去用战争反对战争的以毒攻毒,在此变成扔掉武器的自我解救。在这种思潮主持下的20世纪现代派战争文学之中,英勇的阿喀琉斯终于扔下长矛卸去盔甲,双手抱在胸前冷眼望着人们愚蠢的互相厮杀,嘴角浮现出毕利或尤索林的微笑。在大彻大悟的超脱取代了奋不顾身的英雄精神也取代了泪流满面的同情怜悯之后,人道主义如同一个可爱的孩子一样长大了,长成了一个目光深邃的大人。他不再动辄高声嚷嚷,而是不慌不忙地行动着,既不对未来充满天真的信心,也不对前途完全悲观失望。不管人们是举手赞成还是瞪眼反对,它始终就是这幅模样。

可以说,20世纪的战争文学从对英雄的颂赞转向了对人的注目关切,从对战争场面的描绘走向了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掘探索。这种战争文学的发展趋向,不仅基于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力量,同时也由于历史发展本身使然。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把越来越残酷的战争推到人类面前,一方面又赋予人类越来越强劲的从英雄主义转化到人道主义的能力。而这种历史趋势又与人的个性发现、发展以及逐步确立的进程正相吻合。同西方现代派性文学一样,其战争文

学也是以对人的价值的关注为轴心。既然文学是人学,战争文学又何尝不具有强烈的人本意识呢?

## 《变形记》和《局外人》中的孤独意识

——你是谁?

——我是一只甲壳虫。

伤心的回答。卡夫卡《变形记》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就叫人伤心透顶。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句话划分了一个时代。不仅格里高尔醒了,或者说,卡夫卡醒了,几乎是整个人类醒了,醒在一个异乎寻常的早晨。

“谁是我?”你是我么?不是。他是我么?也不是。在“谁是我”面前,人们只有面对自我,面对孤独。格里高尔在人们的冷漠之下感到孤独和伤心不已,他觉得“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sup>[5]30</sup>。殊不知孤独恰恰就是人们确定自我的重要前提。认识孤独往往意味着认识自己。孤独意识具有对生存的超越性。人们对孤独意识的获得,实质上等于在精神上对自己所习惯了的生存空间进行超越。尤其是在一个被异化了的生存空间中,感受孤独更是人们摆脱异化、寻找自我的有效途径。

孤独意识在其最深层的涵义上,乃是人类生存通过其自我规定所获得的本体意识。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局外人》对具有孤独意识的这种自我实在性作了相当精彩的描绘。莫尔索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意识到了自我的存在,从而按照这种自我意识选择了自己的行动。结果,由于这个觉醒了的自我与非人化世界的格格不入,被判处了死刑。人们不理解他为何不遵守种种社会规范和社会习俗:诸如母亲死去没有哭,对婚姻和事业没有兴趣,仅仅因为那片阳光就向那个阿拉伯人开了枪,对法庭上的辩解漠然置之等等,从而按照他们习惯了的规范和社会习俗将他置于死地。这个局外人似乎被社会清除了,但作为一个孤独者,他却摆脱了甲壳虫世界的吞噬,体现了人类的自为性存在。莫尔索的被处死意味着人类发现了自身的存在而又难以获得这种存在的悲剧,莫尔索由此成了人类经由孤独的人的觉醒和选择走向自我

生存过程中的一个受难者。如果说《变形记》发现了变形,那么《局外人》则发现了自我。

这样的孤独意识不可能在对人充满青春期自信的文艺复兴时期产生,而只能产生于文明高度发展了的 20 世纪。当然,这种产生孤独意识的条件不是古代的征战疆场,也不是中世纪的一座座古堡,而是现代化的城市文明。节奏紧张、喧嚣嘈杂、高楼林立、人口密集的城市生活,造成了一种相互隔阂的心理环境,孤独意识才有了滋生成长的土壤。因此,可以说,孤独意识乃是一种城市意识。它与城市文明有着一种相应性。它表现为一种人类的现代文化意识。它同时又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极度冷漠之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自我、对人类的热情。加缪在为美国版的《局外人》写的序言中曾经这样谈论过冷漠的莫尔索:“他远非麻木不仁,他怀有一种执著而深沉的激情,对于绝对和真实的激情。”<sup>[2]299</sup> 这样的荒诞显然是人们在另一个文化层次上的心理感受。

那么,“我是谁?”“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传统对孤独的理解往往不是被人遗弃的凄凉境况,就是关起门来的孤芳自赏;再有就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自负,把孤独看作高于别人的精神特权。这类孤独都是一种自我封闭的孤独,或者说泯灭了自我的孤独。因为孤独不是什么人的精神特权,而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自我意识。对于传统观念来说,人人孤独的世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现代文明的发展恰恰表明:只有人人具有孤独意识才能使人人面对世界,面对自我,才能彻底结束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等级秩序,才能最终摆脱人类所陷入的非人化处境。“我是一个孤独的人”并不意味着自我与世界的分隔,而是意味着自我可以不再通过“我们”而直接与世界对话。

在文艺复兴期间,人本身成了自己的偶像。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一切都受到了人的一遍遍热情赞颂。人成了天地间的杰作、万物的灵长。在这个人文主义时代,人类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信。面对神秘的世界,人类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探索,并且在每一次探索中发现了自我的征服力量。科学带来文明的巨大进步,这进步瓦解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原有秩序,破坏着传统的社会关系连同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按照一种历史主义的逻辑,随着文明的这种进步,人类理应获得愈益坚定的自信。然而,当人类跨入 20 世纪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多么的渺小,多么的软弱和微不足道。世界大战,经济危机,人类一次又一

次地把自己扔进灾难的深渊;吸毒,自杀,精神分裂,恐怖活动,人类时时刻刻地体验着混乱和荒诞的折磨。一方面是人类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一方面是人类心理机制的急遽紊乱,终于,人类不得不转过身来面对自己,面对你是谁、谁是我、以及我是谁的问题。

无论是《老人与海》、《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第二十二条军规》,还是《变形记》和《局外人》都象征着 20 世纪尤其是战后人类的自我状况。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意味着人类的异化,但人类在每一阶段的异化中都极力地寻找着自己;这个自己不是英雄神明,不是万物灵长,而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自我。人类在被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异化的时候发现了异化,失落了自我的时候发现了自我,迷失了本性的时候发现了本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向自我的递归。这种递归意味着人类在每一步异化的同时进一步接近自己,而异化程度越深,使人类在文明世界面前离自己的人性的面目越远,人类离发现自己重新确立自己的时刻也就越近。“不断加深的自我分裂势必带来更为激烈的修复方式,而不断更新的文明世界又势必给人类带来更为深重的自我分裂。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跑。”<sup>[2]327</sup> 闪闪发亮的历史路轨在一种平衡与不平衡、前进与后退、有序与无序、向心与离心的互力作用之下伸向深邃莫测的没有尽头的未来。

## 参考文献:

- [1] 杨金才. 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2] 李吉力. 李吉力思想文化文集:4.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
- [3] 劳伦斯. 劳伦斯散文选. 马澜,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
- [4] 葛红兵. 轻快的柔板.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 [5] 何太宰. 现代艺术札记——文学大师卷.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王轶梅(1965-),女,江苏常州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主要作品:华裔美国文学译丛《爱的痛苦》。

The Gradual Return to Self: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Self-awareness in 20th Century's Modernist Literature

WANG Yi-me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Shanghai 201620, China )

**Abstract:** The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Each progress in human civilization means its corresponding alienation, but man is striving to seek himself in the meantime. Such endeavor is displayed as the sense of pursuance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he consciousness of sex in *Lady Chatterley's Lover*, the sense of war in *Catch-22*, and the sense of solitariness in *Metamorphosis* and *The Outsider*, to name just a few. Man's return to himself in the light of humanistic spirit is a struggling release from shackles of dehum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nature remaking.

**Key words:** modernist literature; civilization; alienation; self; struggle

( 上接第 55 页 )

Stepping Out of the Icy World:  
An Interpretation of Binary Opposition in Atwood's *Cat's Eye*

YOU Lei

(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03, China )

**Abstract:** The paper,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binary opposition—the prevailing thinking rooted in Western metaphysical tradition, explores the long journey to maturity of the heroine in *Cat's Eye*, a novel by the contemporary Canadian writer Atwood. It traces the process of how she initiates into, internalizes and eventually transcends binary opposition, from the angles of children's games, cat's eye vision, reminiscence and paintings, and points out the vital part played by the re-evaluation of difference in dismantling binary opposition.

**Key words:** Atwood; *Cat's Eye*; binary opposition